

#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百年进路与本土化建构

陈加晋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并非不证自明,而是经历了至少百年的话语构建历程。从近代社会的话语萌发,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历史学的学术话语实践,再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构建的权威性遗产话语体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尺度逐步从个人与家庭的变成国家与国际的,期间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等逐步合流掌握了遗产的话语权。尽管主导当下遗产实践的权威性遗产话语依然是对农业文化遗产最具意义的表达与阐释,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西欧中心主义话语,遗产的多样性被“标准化”,同时在权力关系的分离与倒错现象中容易造成遗产的失真。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需要在统合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以农业历史为基、地方叙事为本、农民群体为重、外国话语为参去开展话语“再建构”。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权威性遗产话语;话语实践;本土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3-0127-12

## The Centennial Approach and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Discourse

CHEN Jiajin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As a discourse practice,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value are not self-evident, but have gone through at least a century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process. From the emergence of discourse in modern society, to the academic discours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o the authoritative heritag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the value scal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uring this peri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gradually merged to master the discourse power of heritage. Although the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that dominates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still the most meaningful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t is essentially a discourse of Western European Centralism, where the diversity of heritage is “standardiz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eparation and inversion of power relations can easily cause distor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 a local discourse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with agricultural history as the foundation, local narrative as the foundation, farmer groups as the focus, and foreign discourse as the participation to carry out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authoritative heritage discourse; discourse practice;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22-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1&ZD225)

[作者简介] 陈加晋(1989-),男,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史。

如果以1920年金陵大学万国鼎主持的古农书工作为起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事业已走过百年历程。从百年前的筚路蓝缕之艰到百年后的遗产申报之热,农业文化遗产俨然蜕变成为高度普及化的社会话语之一,并在文化、政治及经济领域内彰显出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话语力量,以至于当我们重新追溯与审思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遗产的价值”时,已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就实践主体与价值范畴而言,它既是个人的、家庭的,又是地方的、族群的,甚至是国家的、国际的,每个群体似乎都有资格与立场去认知与阐释遗产,彼此之间交织作用并构成了巨大而复杂的话语网络与话语权力关系。现代性社会语境下显现出的遗产“话语”特质为我们打开了农业文化遗产叙事与研究的新窗口,正如李明、王思明指出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话语’,是一个极具鲜明时代‘语境’特征的概念”<sup>①</sup>,以话语角度来看,百年农业文化遗产之路实质就是话语实践之路,特别是万国鼎、石声汉、王思明、苑利、卢勇等学者代代接续致力于概念界定、价值论证、范式探索、学科构建等<sup>②</sup>的相关研究,可以说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话语实践与学科体系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农遗故事虽精彩,但中国农遗话语很贫乏,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事实是从话语视角或以话语分析为工具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自李明等较早指出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本质,并从学术话语与学术共同体角度回顾与展望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sup>③</sup>后,朱娅等人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互动、变迁及体系建构<sup>④</sup>,是为难得的探索之作。屈册、王雅豪等基于话语分析视角,分别探究了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与少数民族群体的相互关系<sup>⑤</sup>,是为话语理论与农遗案例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遗产界,“遗产本质上是话语的建构”<sup>⑥</sup>已是一个重要共识。本是语言学范畴的“话语”,在福柯创造性地将其置于社会实践的中心位置<sup>⑦</sup>后,话语概念具有了进入不同学科的强大渗透力<sup>⑧</sup>。其后,经由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话语分析三维度理论”、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社会遗产话语”等学者们的维度拓展与理论深化<sup>⑨</sup>,话语已成为遗产学最重要的概念与议题之一。在国内文化遗产界,自李军最早运用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反思中国遗产实践<sup>⑩</sup>后,以彭兆荣、吴宗杰、张朝枝、侯松等为代表的学者就遗产话语的生产、互动、文本、建构等及其背后的

① 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什么与怎样保护》,《中国农史》2012年第2期。

② 具体参见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苑利、顾军、徐晓:《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苑利:《正确处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五大关系》,《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③ 李明、路璐:《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书系》,《中国农史》2016年第6期。

④ 朱娅、李明:《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互动、变迁及体系建构》,《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⑤ 屈册、张朝枝:《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7期;王雅豪:《由下至上:遗产话语构建背景下博物馆与少数民族群体相互关系研究——以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为例》,《东南文化》2022年第6期。

⑥ 吴宗杰、姚源源:《周道对大运河的启示:本土遗产话语的道统源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⑦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⑧ 侯松、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理论·方法·展望》,《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

⑨ Fairclough Norma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olity Press, 1992; 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Routledge, 2006.

⑩ 李军:《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制度与权力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sup>①</sup>。有鉴于此,笔者拟借助话语分析的理论工具,探索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百年进路的历史脉络及其背后的话语生产、规则秩序、价值立场等,并在反思当下话语实践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略尽绵薄之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从认知、认同到认定: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百年进路

从逻辑上讲,自从农业出现,农业文化遗产即随之存在,但在古人的认知与言说里,“遗产”一直与“农业”无关,而是密切关联着亲属制度与继嗣原则。有学者统计,从《史记》到《清史稿》的正史记载里,“遗产”一词共出现10次,在超2000年的时间跨度里一直保持“祖先留下的物质遗产”的本义<sup>②</sup>,在这一点上,古代西方亦无不同<sup>③</sup>。这一共存共通于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事实其实已隐晦地表明:农业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证的存在物,而是需要一类“陈述”来表征与构建。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的生成和转向与复杂的社会演化息息相关”<sup>④</sup>,而农业文化遗产之所以没有进入古人的话题,进而成为一类知识、理论与思想,归根结底是缺乏特定或特殊的“历史语境”。对此,王思明曾有具体而精准的总结,“当传统农业仍然以一种主流生产方式普遍存在时,它是一种‘正在进行时’,它一直在传承,但不会被当作‘遗产’受到关注”<sup>⑤</sup>,只有在传统农业逐渐被现代农业取代的现代性语境下,农业才开始具有“遗产”价值,或者说遗产的内涵才会扩容至“农业”领域,从而才有可能孕育出农业文化遗产话语。

### (一)认知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萌芽与初步实践

进入近代社会,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工业”作为迄今为止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生产力量,不单是为中国增加了一项新兴产业,更是快速代替农业成为整个国家社会新的底层逻辑与基本法则,乡村秩序逐渐被破坏,乡村文化随之衰落。面对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代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早先的知识分子很多报以怀疑历史与批判传统的态度,对包括农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叙事<sup>⑥</sup>,典型如康有为,“即其农书,等于词章吟诵之学,而不能施之于用;即使可用,农工不能识考而施行之,况皆旧法,比于日新争巧者,相去亦远矣”<sup>⑦</sup>。但随着西方不断借助战争掠夺、科考之名等造成中国境内文物的严重毁坏和流失,加之西方考古学、博物馆学、建筑学等的本土化发展,国人的遗产保护意识得以在高涨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遗产话语实践的影响中萌生。

在政府层面,1909年民政部首颁《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规定搜辑“古人金石书画并陶瓷各项什物,或宋元精印书籍、石搨碑版之属”并储藏于“博物馆”<sup>⑧</sup>。1916年内务部颁发《保存古物暂行办法》,“湖

① 具体参见彭兆荣:《重建中国仪式话语体系——一种人类学仪式视野》,《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张朝枝:《遗产责任:概念、特征与研究议题》,《旅游学刊》2014年第11期;吴宗杰:《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侯松、吴宗杰:《历史话语何以有用?——从文化遗产探索批评话语分析的文化路径》,《外语研究》2015年第3期;侯松、吴宗杰:《话语分析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解读——以衢州方志中的“文昌殿”为例》,《东南文化》2012年第4期。

② 赵红梅:《论遗产的价值》,《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

③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④ Fairclough Norma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36.

⑤ 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⑥ 杨洪林、姚伟钧:《乡村文化精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⑦ [清]康有为撰,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 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17页。

⑧ 《民政部奏定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北洋官报》1909年第2218期。



渠、堤堰、井泉”等具有农业功能或色彩的古物被纳入保护范围<sup>①</sup>。1930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颁布首部《古物保存法》,并将古物定义为“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sup>②</sup>。在官方系列行为的背后,遗产的主体由个人的、家庭的逐步扩大为公共的、国家的,遗产的范畴也从物质财富逐步涵纳生产、生活类的物质遗存,从而为传统农业进入“遗产”序列不断打通与扩容话语通道。而在学界层面,知识精英们则致力于通过各自的学科特色与学术造诣发展遗产事业,诸如历史与考古学领域的“国粹派”、提倡发展公共机构与博物馆的实务型学者群体等<sup>③</sup>,他们在合流引发了中国遗产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建构与实践。1920年,金陵大学万国鼎组织了志同道合的十多人共同搜集、辑录古籍文献中有关农业的资料<sup>④</sup>,由此开启了农业文化遗产,特别是古籍类农业文化遗产实践的序幕。尽管当时并未出现明确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与学术分类,但是万国鼎对以古农书为代表的传统农业体系有着朴素而深刻的价值认知:“古农书所记,不乏经验之言。往往欧美耗巨资、费时日,累加考验而仅得者,已于数百年前载诸我国农书,是其价值可知。”<sup>⑤</sup>农业文化遗产也终于在“人们的言说、陈述中亮相”<sup>⑥</sup>了。

## (二)认同“农业遗产”:农业历史学的学术话语实践

按福柯的话语理论,学术在实质上不仅是一群话语的组合,而且往往会和位于学术领域之外的更大范围的话语,尤其是与“政治话语”相联动<sup>⑦</sup>,这也正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确立之初的形象写照。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成为最为重要的国家叙事之一,如何看待、认知与处理“传统”自然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提出“正确对待祖国医药遗产”,并号召“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农学遗产,把它发扬光大,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sup>⑧</sup>,农业的“遗产”属性与现实价值由此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同。1955年1月,农业历史学家王毓瑚率先响应中央精神并发表《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农业文化遗产第一次以“农业遗产”之名进入农业历史学领域<sup>⑨</sup>。1955年4月农业部组织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同年7月,首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1958年,首个农业文化遗产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成功创刊,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从体制与组织上赋予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合法性”与战略意义,也标志着“农业遗产”开始成为农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核心话语。

此后,在国家政治话语的旗帜下,以万国鼎、石声汉、梁家勉等为代表的农史学者通过概念化与学科化不断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话语体系。1956年8月,万国鼎在《祖国的丰富的农学遗产》中指出:“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他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sup>⑩</sup>简而言之,农业文化

① 李建:《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化的发端——论清末〈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及其历史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09页。

③ 参见朱煜杰:《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观念与实践:以帝国为中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④ 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总序》,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

⑤ 万国鼎:《古农书概论》,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329页。

⑥ 肖锦龙:《福柯理论视野中的话语——从〈知识考古学谈起〉》,《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⑦ 参见宋奕:《话语中的文化遗产:来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⑧ 石声汉:《对整理校印古农书工作的建议》,《石声汉农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90页。

⑨ 参见王毓瑚:《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⑩ 万国鼎:《祖国的丰富的农学遗产》,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316页。

遗产既包括古代农业文献、考古发掘材料,也包括农民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1958年,石声汉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中对农学遗产进行界定,即“从祖先继承下来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遗产”的基础上,首次明确进行了外延性划分,也就是“具体实物”与“技术方法”两大类<sup>①</sup>。可见,在农业历史学的话语实践中,农业文化遗产被认知与理解为一类传统农业知识与经验的集成,“农业遗产”“农学遗产”等学术概念交替混用的行为<sup>②</sup>也被默认为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

正如福柯所总结的,遗产是“社会实践,系统地建构其言说的对象与事物”<sup>③</sup>,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历史学家们的表征和言说中被规定了内涵与外延,并以此为“语码”逐步塑造衍生与之相关的知识、理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农业历史学客观上拥有了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命名、分类等在内的学术话语权,并借此成为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正统。在此话语系统内,以历史文献(农书、方志等)作为遗产“文本”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知识、理论与智慧成为应然且必然的实践路径,因此20世纪下半叶期间,各大农业文化遗产科教单位均不约而同地将工作重点放在古代农学典籍的搜集、整理与校注上<sup>④</sup>,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出诸如“精耕细作”“天人合一”等经典表述。尽管这一时期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仍然脱离不了“基于‘现在的’需要而创造性地挑选、命名、重组‘过去的’文化资源”<sup>⑤</sup>的性质,但对于农业历史的诠释及浓厚的本土色彩都是当下难以具备的。

### (三)认定“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构建的权威性遗产话语体系

2002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主导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计划,并重新定义了农业文化遗产:“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sup>⑥</sup>显然,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认可的“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历史学的“农业遗产”已完全不同,不仅变更了称谓及表述,更是重置了遗产认知与阐释的背后逻辑。

严格来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只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应对人类面临的可持续问题<sup>⑦</sup>而设立的一项大型国际项目,所谓的“定义”也只是给出了选择和认定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的标准<sup>⑧</sup>,但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自身的超然地位,以及其赋予了农业文化遗产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全球重要意义”<sup>⑨</sup>,因此很快且几乎无可争议地成为一种权威性话语。中国“作为 GIAHS 倡议最早响应者和积极参与者”<sup>⑩</sup>的历史事实无疑反映了我国对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话语权威性的认可,同时也是该权威性的直接体现。2012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NIAHS),从内涵界定、目标诉求到遗产标准、认定思路等都整体沿袭FAO的遗产理念与知识框架,并且NIAHS在事实上成为国内GIAHS候选名录与权威遗产体系。2021—2023年,江苏省率先发布了第一、二批省级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初步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国家—省”的三级认定体系雏形。

基于全球重要农业遗产背后的原则、规范、制度等,传统农业的“遗产化”过程被简化与标准化成了一个最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选择、认定、监督及解释的制度性机制,遗产的申报和管理主体是缔约国,农

① 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② 朱娅、李明:《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互动、变迁及体系建构》,《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③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2010年,第32页。

④ 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⑤ 王杰文:《“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民俗研究》2016年第4期。

⑥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资源科学》2006年第4期。

⑦ 孙庆忠、关瑶:《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路径与研究进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⑧ 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⑨ 闵庆文、赵立军、叶明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罗马会议及其主要成果》,《地理研究》2007年第1期。

⑩ 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一个全新的领域》,《旅游学刊》2022年第6期。

业文化遗产在实质上成为一项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遗产运动”。据闵庆文的解读,GIAHS的认定指标囊括三个方面,即包括突出特征、可持续性的历史证明、全球重要性的基本标准,以及关联标准与实施标准<sup>①</sup>。在流程层面,联合国通过不断优化完善技术流程,同时制定相关制度与文本,使得GIAHS的话语实践越发呈现出“标准化”的特质。作为国内权威的NIAHS体系在这一方面体现得可能更加鲜明:农业农村部除颁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编写导则》《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写导则》等纲领性文件以外,在每一批次的NIAHS认定工作启动时都会发布《通知》以传达各项要求和规范,包括目标要求、申报要求、申报程序、工作要求等。在此情况下,热衷于遗产申报的地方政府在遗产的表述、保护、管理、利用等各个方面只需套用管理单位或权威机构的知识框架与实践经验<sup>②</sup>。此时的农业文化遗产,已不仅仅是先辈的“遗留物”,更是一种带有权力化符号的特征社会再生产的产物<sup>③</sup>。

## 二、西方标准与中国叙事:农业文化遗产权威性话语的反思与本土化探索

联合国粮农组织构建的权威性遗产话语体系,让遍布于全世界“记忆角落”的农业文化遗产获得了被关注与认同的可能,同时直接导致了国内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新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共商与主导下,中国自2005年起就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惜的是直未能再进一步成为规则制定者、遗产阐释者及文化输出者,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本土遗产话语体系尚不完善。在GIAHS倡议提出后的20年里,农业文化遗产权威性话语实践越发显现出一些问题,同时,国内不同的话语主体或群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探索。

### (一)面向农业文化遗产权威性话语的反思

据张朝枝等人的追溯,国际遗产界对于权威话语实践的反思与批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初成学派<sup>④</sup>,不过“权威性遗产话语”(AHD)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称谓,则是劳拉简·史密斯于2006年《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一书中首次提出<sup>⑤</sup>。当遗产批判学者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主导的世界遗产体系发起全面且猛烈的进攻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倡议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处于初始期而尚未进入批判的视野,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设想、理念到规范、行动,农业文化遗产之于早前的遗产体系是具有延续性与借鉴性的,甚至GIAHS项目的早期目标之一就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的一种类型”<sup>⑥</sup>。在20多年的实践历程里,农业文化遗产权威性话语越发显现出既趋同于其他遗产又具自身独特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就话语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主义”。尽管权威性话语以区域/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实践蓝图看似普世与中立,但一旦涉及“谁来定义”这一根本问题就无法回避天生自带的西方历史观与文化基因。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天遍布全球的‘遗产’语言,本质上是源自西方的”<sup>⑦</sup>,农业文化遗产权威话语的实践源头正是西欧国家“二十世纪后半期,或十九世纪晚期的应对现代性的潮流”<sup>⑧</sup>,并且基于西欧国家的思维、逻辑与知识体系所建构而成,

①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标准解读及其启示》,《资源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参见吴宗杰:《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构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④ 张朝枝、蒋钦宇:《批判遗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6期。

⑤ Laura 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Routledge, 2006.

⑥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资源科学》2009年第6期。

⑦ David Lowenthal. *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The Free Press, 1998.P.5.

⑧ Laura Jane Smith. *General Introduction, Cultural Heritage: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Vol. I*. Routledge, 2006, PP.5-6.



因此从根本上而言,当下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以西欧为中心的文化强权话语,特别是21世纪之前的国际文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依据亚洲国家地区遗产保护需要而制定的”<sup>①</sup>。GIAHS看似公正科学的评价标准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欧国家的知识体系与审美旨趣<sup>②</sup>,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下GIHAS话活实践的困局:美洲与非洲地区似乎普遍不重视,即便重视也难以申报成功,这就势必加速本地农业文化遗产的消亡<sup>③</sup>;亚洲地区虽高度重视农业文化遗产且成为“优等生”,但实质上是遗产话语的适应者而非制定者,更重要的是当本地的遗产资源在经文本改造达到标准后,必然会同化甚至吞噬本土的历史意识、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

其次,就话语属性而言,它生产的是一种“标准化”的多样性。作为各国各地区农业文明的多态表达,“多样性”是农业文化遗产最本质的属性,也是权威性遗产话语体系内的重大议题之一。具体到GIAHS,无论是内涵界定还是申报标准都明确规定有“生物多样性”内容,其余诸如农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等也都是应有之义,但是各国在阐释与展示多样性内容之前,其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被一个或多个统一的“标准”所预设<sup>④</sup>,并且在成为“遗产”的过程中时刻被一套国际化的认识与技术性框架所评判、改造与支配,也就是彭兆荣所总结的,“以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模式化、法规化、行政化的‘流水线’作业和以操作程序相似和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sup>⑤</sup>。而一旦进入遗产名录,农业文化遗产客观上也进入到一个“价值的国际等级体系”<sup>⑥</sup>,这是对遗产多样性的另一种消解,同时遗产自身不证自明的价值被等级结构所裹挟。“多样性”只有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任何对国际标准的反抗都极其艰难,这并非悲观的论调,而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体系的必然结果。

再次,就话语主体而言,它产生了权力关系的分离与倒错现象。话语即权力<sup>⑦</sup>,权威性话语的背后是权威性的话语主体,无论权力如何表征,其背后的主体是明确的,也就是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农业农村部为代表的政府单位,以及背后的专家学者团,而农民群体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与理论上最重要的话语主体,却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其余边缘性群体,如工人、女性等更被排除在话语权力网络之外。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叙事中,从挖掘到管理、从区域认同到国家认可等几乎所有过程与环节,都是由强势话语主体所决定与主导的:政府借助公共权力成为遗产的政策制定者与方向引导者,专家通过知识创造与资政权力成为遗产的解释者与赋权者<sup>⑧</sup>。当政治权力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代言人”后,遗产与遗产地、所有权与处置权、阐释权与话语权等均会发生严重的剥离,进而导致农民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产生抱怨乃至冲突,例如燕海鸣等就描述过哈尼梯田遗产地所发生的“一面是完美的遗产保护,另一面是怨声载道的生活诉求”<sup>⑨</sup>的场景。更严重的,农民在失语与失权后势必将失去与农业文化遗产建立关系的动力与能力<sup>⑩</sup>,从而致使农业文化遗产失去存续的基础。

最后,就话语价值而言,它容易造成遗产的失真。在权威性话语体系内,农业文化遗产深度附着于

① 张政伟、王运良:《国家软实力与文化遗产》,《世界文化》2008年第6期。

② 李沛、苏小燕:《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地位提升路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③ 潘宝:《遗产人类学视域中文化表征的再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李正欢:《话语、权力与目的地治理转型:鼓浪屿遗产化研究》,《旅游论坛》2015年第2期。

⑤ 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 Harrison Rodney.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116.

⑦ 参见安传艳、李同昇、翟洲燕:《话语、资本与遗址区空间的生产——以安阳市殷墟为例》,《旅游学刊》2021年第7期。

⑧ 陈加晋、卢勇:《在解构与重构之间:农业遗产与工业文明交互中的文化认同困境》,《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⑨ 燕海鸣、解立:《标准化的多样性:云南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话语和“去地方化”进程》,《东南文化》2020年第6期。

⑩ 参见孙九霞、周一:《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地理研究》2015年第12期。

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附加值”，本地人被排斥在决策规划过程之外，作为“他者”的话语权掌握者则根据自身立场与利益来掺入“主观的、描述的和解释的经验”<sup>①</sup>，由此就引发了遗产的失真现象，并且失真程度取决于知识、权力和资本等强势话语之间的协商与博弈<sup>②</sup>。在GIHAS申报阶段，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最权威的一方，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地方既有农业知识体系和农耕文化记忆进行重新论述。在“成为遗产后”的阶段，政府作为最权威的主体，通常会将遗产转化为考察各行政部门“业绩”的指标之一，大规模的“遗产旅游”应运而生。遗产旅游可谓农业文化遗产造假最为严重的场域，因为在游客与遗产的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的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sup>③</sup>，遗产地为迎合游客会极大地改造甚至制造遗产，例如将文化内容简化为指示性的符号、将神圣的文化仪式搬上舞台定期展演、将传统民居越建越奢雅等，而这些所谓的遗产承载的只是虚妄的价值。

## （二）权威性话语影响下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本土化探索

就现行阶段而言，我们可能无法准确断定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本土化探索的缘起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一直孕育有“本土化”的基因与情节，特别是主管全国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农业农村部，无论是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定性、定位还是管理、治理必然要考虑落实性、适应性及执行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妄自揣测，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GIAHS后，农业农村部多年来一度只是在“申遗”工作上配合与紧跟FAO，其余并未有大的政策性行动，这种看似“不重视”的背后，很可能就有如何将农业文化遗产有效嵌入农业发展与农村治理等国家叙事的统筹思量与工作准备。

2012年农业部首次发布《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或许可称得上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本土化的先行尝试与初步彰显。在该《通知》中，开宗明义便是“重要意义”，具体包括：一是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二是保护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三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四是丰富休闲农业发展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sup>④</sup>。不难看出，尽管其中涉及“农业可持续”与“农业资源”的表述具有明显的GIAHS话语痕迹，但在至少两个方面显现出鲜明的本土色彩，一是以党中央的政治话语为引领并与之融合<sup>⑤</sup>，二是更加侧重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而非GIAHS强调的“产业”属性（土地利用系统）。当然，这两者也可被视为一个方面，因为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传承、转化与利用历来是国家的基本叙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是成为党的重大部署与国家战略。

其后，以NIHAS体系为中心，本土话语的探索与深化基本沿袭上述两条进路。在第一条路线上，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实践主动、迅速对接并被统合其中，与之关系及遗产价值的定位也逐步从“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积极贡献”<sup>⑥</sup>发展至“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性工作”<sup>⑦</sup>。在第二条路线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农耕文明”现实载体与“农耕文化”当代呈现的性质越发明晰，以至于有学者受此影响提出了“农耕文化遗产”这一新的学术话语<sup>⑧</sup>。此外，官方未曾明言的一个事

①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潘君瑶：《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

③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赋、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④ 《农业部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2012年04月20日，[http://www.moa.gov.cn/nybg/2012/dsq/201805/t20180514\\_6141988.htm](http://www.moa.gov.cn/nybg/2012/dsq/201805/t20180514_6141988.htm)。

⑤ 闵庆文：《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回顾与前瞻》，《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2019年05月20日，[http://www.shsys.moa.gov.cn/zcjd/201905/t20190520\\_6311064.htm](http://www.shsys.moa.gov.cn/zcjd/201905/t20190520_6311064.htm)。

⑦ 《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工作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2020年12月14日，[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12/t20201214\\_6358075.htm](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12/t20201214_6358075.htm)。

⑧ 张灿强、龙文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



实是, NIAHS体系对并不符合GIAHS“复合性”指标的农业系统一直保留一定的空间。据笔者统计, NIAHS名录中有近1/5(26项)的农业系统是单纯的种植或养殖系统, 这是申报者与决策者们不谋而合的认同。中华农业文化遗产体系之大、内涵之博、智慧之深, “即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体系亦难以囊括”<sup>①</sup>。

此外, 在学术话语层面, 农业文化遗产学人对于国家政策与政治话语同样高度敏感, 典型一例即“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不到一年里, 就有闵庆文、孙庆忠、卢勇等多名学者先后发声<sup>②</sup>, 并提出了“引擎说”“造血力说”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sup>③</sup>。同时, 农业文化遗产本土化的话语实践也附着于各自的学科体系与学术逻辑不断拓展与深化。特别是农业历史学学科, 自GIAHS话语引入中国后, 王思明等就致力于将本学科深厚的“农业遗产”学术传统与“农业文化遗产”话语融合, 并初步构建起“广义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sup>④</sup>。以卢勇为代表的学者则眼界向外, 一方面不断发掘与延伸农业文化遗产的学理内涵, 在构筑“环境变迁—生产应对—特色农业—农业文化遗产”逻辑链的基础上, 将农业文化遗产置入了环境史与农业史多重审视的框架内<sup>⑤</sup>, 另一方面又不断借助元宇宙等新兴技术概念<sup>⑥</sup>来拓展乃至突破农业文化遗产边界, 从而不断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学的新范式。无论是学科体系的扩容, 还是学术范式的创新, 或许都能成为未来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土话语形态。

### 三、在权威与批判之间: 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

诚如彭兆荣所指, “一个国家的遗产事业是否繁荣和具有独特性, 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一套既根植于本土、又对接国际规则的遗产话语体系”<sup>⑦</sup>。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应用为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套可行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难点在于选择何种类型的分析话语及使用的限度。任何“体系”的构建都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 权威性话语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优势在于, 既可以对旧有的遗产叙事与书写方式进行批判与解构, 又可以根据需求去建构或重构新的遗产话语,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土化实践来说, 重要的第一步是显化并选取不同话语范畴内的结构关系。

#### (一) 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视角选择

权威性遗产话语(AHD)与批判性话语(CDA)代表着当下遗产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与主流的两支。如果说权威性遗产话语主导着全球遗产实践<sup>⑧</sup>是一个基本事实的话, 那么清晰揭示这一事实的就是批判性遗产话语。批判性话语的产生之因与立命之本就是批判权威性话语, “权威”与“批判”就如同一块“镜子”的正反两面, 相互对立又同为一体, 共同构成了当下遗产话语的二元结构。前者的视野是“自上而下”, 话语主体是以官员、专家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 后者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新视角, 在关注农民、工人、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sup>⑨</sup>的同时, 希望以其为主体力量来构建有意义的遗产。

① 彭兆荣:《论中国农业遗产的生态智慧——以梯田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 陈加晋、卢勇:《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事业:时代转向及历史方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 参见卢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精准扶贫提供可持续造血力》,光明网·理论频道,2019年5月11日, [https://m.gmw.cn/2019-05/11/content\\_32826408.htm](https://m.gmw.cn/2019-05/11/content_32826408.htm); 闵庆文、曹幸穗:《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意义》,《中国投资》2018年17期。

④ 参见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⑤ 伽红凯、卢勇、陈晖:《环境适应与技术选择: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21年第4期。

⑥ 卢勇、任思博:《农业文化遗产元宇宙的内涵、路径及应用前景研究》,《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⑦ 彭兆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⑧ 侯松、吴宗杰:《“古迹”与遗产政治的跨文化解读》,《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1期。

⑨ 参见张柔然、刘亦雪:《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为例探索利益相关者遗产话语权》,《东南文化》2022年第1期。

总体上,批判话语既揭示了权威话语的弊端,又弥合了权威话语框架的“缝隙”,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话语视角,但是批判话语的批评过于尖锐与绝对化,其在遗产表征与建构的话语基础上,放大了“建构”的威力而忽视了遗产本体或实体的客观存在。倘若劳拉简·史密斯所宣称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遗产”<sup>①</sup>成立的话,那么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与稀缺性就无法解释,权威性遗产话语为何能够经历时间的检验而成为主流的事实则更会令人费解,故在中国很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遗产话语研究不应该照搬西方的“锐角”批评模式,而应走“钝角”批评之路<sup>②</sup>。更关键的是,批判话语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解决之道,也就是尹凯所总结的“长于修辞的变革而短于实际的操作”<sup>③</sup>,例如在批判世界遗产名录只是西方贵族阶级基于政治与权力干预下的“政治构造”<sup>④</sup>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更好或不一样的“遗产化”路径。而一些带有“方案”色彩的设想,如对遗产“进行自下而上的重建”<sup>⑤</sup>,也因难以实现或很可能生出更多的新问题而流于悬浮。

显然,无论是对权威性遗产话语,还是基于批判权威的批判性遗产话语来说,整体性地把握遗产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更何况,作为几乎最晚出现的权威话语类型分支,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超脱性,“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不应只是深入国人内心的情感认同,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也就是说,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比其他类型的遗产更加不言而喻,以之为构建对象的遗产话语自然更接近常识与“真理”,不同国家与阶层的群体在价值认知与审美判断方面的差异与矛盾也会小得多。基于此,我们在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的路径上,不应单独选择其一,也不应采取对抗的姿态。二者之间的“对立”恰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权威与批判的结合才能在话语上共同组成遗产的整体结构,真正科学的本土化遗产实践要将二者进行“协商”与“统合”<sup>⑥</sup>,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与切入点进而来绘制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的图景。

## (二)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实践范畴

由介于权威与批判之间的话语分析出发,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不同实践范畴内的结构关系着手,具体包括:历史范畴的传统与现代、地域范畴的地方与国家、主体范畴的农民群体与权威群体、跨文化范畴的国内与国外等四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或竞争、或冲突、或断裂、或模糊,这就需要我们在拨开万象的基础上进行调配、协商、包容与融合。

第一,以农业历史为基,充分发掘历史文本资源与提炼中华农耕话语。遗产虽非纯粹的历史,但对过去无论以何种方式与程度进行重新解读,“历史”与“历时性”永远是遗产的首要前提与第一属性。作为一类“历史遗留物”,农业文化遗产必须经历历史的积淀与考验,也就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的历史过程,否则遗产既无法传续后人也无法展现自身价值,这也是 GIAHS 与 NIAHS 体系均规定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超过 100 年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农耕文明垂万年而不可朽,内涵广博精深,体系独树于世界之林,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与想象力。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而言,这是话语本土性之根源,也是话语本土化之资源,甚至是本土话语之自身。我们一方面要回望农耕传统、挖掘历史资源,特别是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不仅是重要的本土历史文本,也是理解古人看待历史与遗产的本土话语碎片<sup>⑦</sup>,诸如古农书中对于地方农业生产的刻画与知识表达、方志

① Laura 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p.299.

② 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③ 尹凯:《从科学到研究:遗产图景的制度化与混杂性》,《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Batteau A. *Appalachia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 theory of shared misunderstandings*. *Appalachian Journal*, NO.7,1979, PP.9-31.

⑤ 朱刚:《从历史到现实:批判遗产研究探骊》,《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⑥ 林斌、尤泽顺:《传统遗产研究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对立叙事与协商》,《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

⑦ 参见侯松、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理论·方法·展望》,《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

中对于农业物产信息的记录方式<sup>①</sup>等。另一方面要聆听祖先声音、提炼先民智慧,中国先辈们对历史、过去以及今天所说的“农业文化遗产”都有深刻思考,由农业生产经验总结而出的天人合一、三才理论、地力常新壮、耕读传家、二十四节气<sup>②</sup>等理念与理论支撑中华传统农业传统至今,其中更有不少升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及叙事方式,这是独具中国传统特色与本土气象的农业历史话语体系。

第二,以乡村叙事为本,坚定守护遗产家园生态与活化农村日常空间。随着权威性话语的主流化,农业文化遗产的政治语义边界也越来越膨胀,从“地方的”不断扩大为“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当人们眼光不断向上与朝外的时候,遗产的地方性表述往往湮没在现代民族、国家或全球的宏大叙事中<sup>③</sup>,本应是农业文化遗产话语基本单位的“地方话语”就容易被人忽略。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方是遗产的原生之地和寄生之处<sup>④</sup>,具体到农业文化遗产语境也就是农民“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大地。农业生产者依托土地资源开展集体性农业生产,同时依附地理空间聚群而居,进而通过社会性活动慢慢缔结亲密而稳定的族群关系,彼此共同恪守同一套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及乡风民俗<sup>⑤</sup>。农业文化遗产生成的逻辑过程表明,正是乡村构筑了遗产统一体的地理空间与人文边界,这也是 GIAHS/NIAHS 申报文本遵循或默认以一个或多个村落为核心区的主要原因。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固然可以同时隶属多个范畴,但最具归属感的永远是承载着集体记忆、凝聚着大众乡愁的遗产家园<sup>⑥</sup>,只要不脱离遗产地的日常性与地方性阐释,让场域中的“每个人都在描绘,每个人都在被描绘,描绘的行为从不中断”<sup>⑦</sup>,那么作为民族共同记忆与身份构建的农业文化遗产就一直保有中国最基本的乡土底色。

第三,以农民群体为重,注重倾听边缘主体诉求与调试话语权力关系。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无可争议的创造者、使用者与传承者,其在农业文化遗产叙事中的群体性失声可谓是当下权威性遗产话语实践的基础弊病,诸如遗产的所有权、真实性、保护原则等环节产生的问题基本都可追溯至此<sup>⑧</sup>。但另一方面,这又是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必然,甚至是历史潮流中必要的“局部性牺牲”,因为只有权威或官方语境下,农业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才能最大化,农业文化遗产之所以被视作集体身份认同的载体与国家的历史档案<sup>⑨</sup>,没有国家的权力运作与立法授权而仅靠一帮农民或遗产地居民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出发,我们无意于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而是强调在此框架内能最大化地容纳不同的主体与群体,尽可能地倾听边缘主体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分配好各自的权利与责任。与文化多样性的道理相类似,政治或制度层面亦需多元与多样,更何况农民本就是遗产本土性实践的基石。任何“它者”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或服从更权威的一方去改造或重新论述遗产,只有作为唯一生产主体的农民不会,因为没有农民的生产实践,农业文化遗产不会产生;没有农业文化遗产的供给,农民身份也不会存续,这种相互依附的关系正是农民忠诚感与遗产真实性、本土性的来源。

第四,以外国话语为参,积极借鉴西方遗产保护实践与讲好中国农遗故事。我们在对内探索与构建本土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体系的同时,还应全面正确地了解、认知、学习外国遗产实践与话语经验。正如

- ① 包平、李昕升、卢勇:《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以〈方志物产〉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
- ② 隋斌、张建军:《二十四节气的内涵、价值及传承发展》,《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 ③ 龚坚:《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视角——以武夷山的城村为例》,《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 ④ 彭兆荣:《变迁的文化与固定的地方——文化遗产研究的人类学视野》,《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 ⑤ 陈加晋、李立、卢勇:《美学发现与价值重塑:农业文化遗产的审美转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 ⑥ 彭兆荣:《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 ⑦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
- ⑧ Bart J.M.van der Aa, Peter D. Groote & Paulus P.P.Huigen, *World Heritage as NIMBY? The Case of the Dutch Part of the Wadden Sea*. In D·Harrison, M·Hitchcock.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PP.7-8, 11.
- ⑨ 胡惠林:《文化遗产安全:一个人类文化安全议程》,《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的,“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对话与遗产互鉴是不同文明、国家及区域在农业文化遗产叙事过程中增进互信与互补、共享与共建的有效手段与不竭动力。以外国遗产话语为参,不仅自身的本土性不会减弱或丢失,反而能从差距中吸收文化营养,从差异中激发文化自信。事实上,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实践与话语体系本身就是兼容并包、融同化异的产物,尤其是大量外域作物陆续传入后催生了国人“‘胡化’的生活”<sup>①</sup>。中国作为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也曾向世界输送了发达的农业文化,没有中国水稻文化与朱鹮驯养技术的传入,很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sup>②</sup>。基于此,我们应根据遗产特点、国家背景、互鉴目标等,设计最优遗产互鉴方案,与各国交流的同时注重展示与传播中国农遗故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中主动参与制度设计,并积极提出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

## 结 语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农业基因,寄托着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同时还是当下不少农民生产生活的根基,当我们在认同传统与传承遗产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天生,也并非一成不变。与其说农业文化遗产赋予人们以身份,倒不如说是人们赋予农业文化遗产以价值。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实践历程也表明:传统农业的“遗产化”并不是简单地“过去”进行还原,而是在“现在”的语境与话语之中,基于对“现在”与“未来”的期望而筛选、建构与重构“过去”。其间,农业文化遗产经历了话语从无到有、内涵从小到大、价值从少到多、产权从私到公的演变过程,直至今天成为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全人类”叙事。以“话语”视角观之,一个过去我们可能难以理解的历史现象被清晰地揭示,即农业文化遗产学术史与中国传统史学史相比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变性与割裂性,特别是21世纪初的“农业文化遗产”与前序的“农业遗产”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延续性,原因就在于话语主体及其背后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本质不同。

在走过百年道路后,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典型又带有自身独特性的权威性话语实践,对于其中的问题与弊端我们固然要进行反思与批判,但需明白,遗产既是资源也是权力<sup>③</sup>,在农业文化遗产不断被定义、规范、规划、决策的过程中,国际权威组织、政府及专家等成为强势主体是一种必然,甚至是一种趋势,因为就当下而言,权威性遗产话语依然是对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价值最具意义的表达与阐释,制定“遗产名录”依然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价值实现最有效的方式。只有以此认知为基础,我们在加强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意识与本领的同时不至于走偏或走窄,从而避免本土话语体系变相成为另一种权威。总之,本土农业文化遗产话语虽是“立新”,但并非彻底的“破旧”,它是古与现、中与西、上与下的跨文化融合,并且无论文本如何多样,或主体如何多元,都无法保证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一种传统农业文化形态都能避免消亡。但至少可以肯定,农业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会一直长存,通俗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既是“老的”也是“活的”,从这个角度看,长于历史分析的农业历史学与聚焦乡村社会的人类学、民俗学等将在今后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实践中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樊志民:《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生命世界》2008年第7期。

② 参见卢勇、王思明:《引进与重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日本佐渡岛朱鹮—稻田共生系统”的经验与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③ 潘宝:《作为重构物与人秩序的遗产》,《民族艺术》2018年第3期。